



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批判及其思想飞跃

余梅溪 刘同舫

摘要:青年马克思曾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但大学时代以后马克思思想中的浪漫主义因素就一直处于潜隐状态。直至 1844 年底,马克思为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分析了浪漫主义小说《巴黎的秘密》,再次与浪漫主义相遇。从这次相遇的情况来看,马克思同浪漫主义在如何解决现有之物与应有之物的对立、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上出现了“精神”还是“实践”的分歧。马克思不满于浪漫主义拔高精神实现绝对同一性的路径,反对浪漫主义无视现实物质力量而停留在思辨领域的唯心史观。马克思将否定辩证法带入现实,以实践为中介超越了浪漫主义反讽。通过树立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马克思阐发了物质生产实践推进历史前进的思想,指明了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马克思;浪漫主义;《巴黎的秘密》;《神圣家族》;实践观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5.0104

收稿日期:2024-08-26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优秀文学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B2302070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余梅溪,女,江苏东海人,法学博士,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E-mail: 20220152@hhu.edu.cn;
刘同舫,男,湖北天门人,法学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浪漫主义是西方文化在反思启蒙理性、古典主义以及市民社会过程中的自我救赎。19 世纪,浪漫主义在德国方兴未艾^①,其影响并不局限于文学,更广泛渗透到哲学、政治等领域。青年马克思在求学期间曾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②,不仅创作了诸多饱含浪漫主义精神的诗歌,还在其博士论文中尝试使用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象征人的独立与自由的个别自我意识去冲破绝对对精神的主宰,反对黑格尔哲学将自我意识视作绝对精神发展过程的中介。但同浪漫主义所具有的缺陷一致,此时的马克思虽把个别自我意识看作实践的主观形式,但这种实践只是以哲学为武器的批判活动,未能意识到现实的主体力量对思想武器的决定性作用。而自 1841 年 3 月博士论文完稿以后,由于研究重心的转变,马克思思想中的浪漫主义因素就一直处于潜隐状态,这使得马克思对待浪漫主义的态度成为思想史研究的悬案。直至 1844 年底,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

^①由于浪漫主义在不同地域和时期具有差异性,学界往往将其作为一个集合性概念来使用,甚至有学者指出,理解浪漫主义的唯一恰当方式就是将其考虑为复数,企图为其寻求一个统一定义的努力注定遭遇失败〔参见:Peter Gay, *Why the Romantics Matt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rologue, xiii-xiv〕。而在浪漫主义的集合中,德国的浪漫主义具有一些特殊性,这主要是从其与启蒙运动的关系中得以体现的。由于被法国占领和对雅各宾党实施专政的失望,德国浪漫主义带有反对法国以至于反启蒙精神的思想特点,导致德国浪漫主义希望控制德意志精神生活并表现出保守的民族主义倾向。本文所涉及的浪漫主义主要是指马克思青年时代接触的以施莱格尔兄弟为代表的晚期耶拿派浪漫主义。

^②在学生时代,马克思与浪漫主义的初次相遇,主要体现在课程学习兴趣与文学创作活动上。马克思曾受到波恩大学浓厚的浪漫主义氛围影响,根据马克思在波恩大学的课程表,他曾选修德国浪漫派主要成员之一冯·施勒格尔开设的“荷马问题”和“普罗佩尔提乌斯的《哀歌》”以及韦尔克讲授的“希腊罗马神话”(参见:《波恩大学肄业证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36—937 页)。马克思同燕妮的热恋以及燕妮父亲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对浪漫主义的热情也强化了马克思进行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意愿。

一部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法国畅销小说《巴黎的秘密》进行了分析,再次呈现了他与浪漫主义的思想关系,成为理解马克思思想转变的潜在线索。从《神圣家族》相关章节的内容来看,马克思在1844年已成为浪漫主义的反对者,他不仅批判了浪漫主义具有空想性质的社会变革诉求,并基于唯物史观阐明了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与学生时代马克思的相关态度存在极大反差。本文力图着眼于《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与浪漫主义的再次相遇,尝试分析马克思由学生时代至发现唯物史观期间对浪漫主义态度的转变,从而揭开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这一潜隐的暗线。

一 马克思与浪漫主义的再次相遇:《神圣家族》对《巴黎的秘密》的分析

在学生时代与浪漫主义的初次邂逅之后,大学毕业的马克思几乎再未正视过当时德国流行的浪漫主义思潮^①。一方面,马克思在1842年开始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后不得不面对诸多现实问题而无暇顾及文学创作;另一方面,物质利益难题导致马克思逐渐将重心转向对政治和国民经济学的研究。直至1844年底,面对青年黑格尔派利用热销的浪漫主义小说《巴黎的秘密》兜售思辨哲学的行为,马克思决定在《神圣家族》中对该小说展开评析,这成为马克思与浪漫主义再次相遇的契机。

《巴黎的秘密》是法国作家欧仁·苏于1842年到1843年创作并在法国《论战报》(*Journal des débats*)上连载的著名小说。该小说描写了大量不为上流社会所知的底层大众生活并称为“秘密”,意外收获了底层群众的共鸣。欧仁·苏在创作后期有意收集相关素材,使小说更为真实地反映底层群众的生活状况,并尝试在小说中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由此,同时激发了上层阶级猎奇心与底层群众同理心的《巴黎的秘密》获得了全社会的广泛欢迎。1844年6月,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弗兰茨·齐赫林斯基以笔名“塞利加—维什努”(以下简称“塞利加”)在《文学总汇报》第7期发表长文赞赏《巴黎的秘密》,通过抽象《巴黎的秘密》中所描述的社会底层“秘密”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思辨解读,企图利用小说的通俗性和知名度宣扬思辨哲学。为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专门用两章(第五章、第八章)的篇幅对《巴黎的秘密》展开辨析,力图还原并批判小说的思想内容,借助小说的知名度向群众揭露思辨哲学的局限性。

马克思分析《巴黎的秘密》时使用了独特的论战式解读方法,即置身批判对象的话语体系,根据对象本身的性质展开论述。在《神圣家族》的《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的阐述自然要取决于阐述的对象。批判的批判在各方面都低于德国的理论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因此,如果我们在这本书中不再对这一发展本身进行评论,那是因为我们所阐述的对象的本性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做。更确切地说,是批判的批判使我们不得不用现已达到的成果本身来批驳它。”^②在当时的德国,理论发展正在逐渐超越黑格尔哲学的局限,这些理论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蒲鲁东的经济学等。但青年黑格尔派仍停留在拙劣地模仿和运用黑格尔哲学的水平,仅凭德国理论界“现已达到的成果”就足以对“批判的批判”完成批判。当塞利加企图利用小说《巴黎的秘密》的影响力兜售思辨哲学时,马克思置身于小说本身的浪漫主义话语体系对塞利加展开反驳,直接导致了马克思再次直面他自学生时代后渐行渐远的浪漫主义。

论战式解读表现为马克思借用浪漫主义的讽刺对塞利加展开反驳。马克思认为,塞利加将思辨抽象化了的“秘密”与以“秘密”构成的思辨世界二者相统一的解读看似无懈可击,实则属于循环论证关系的闭环生成逻辑。为还原小说的真实主旨,马克思使用讽刺来消解思辨哲学的滑稽解读。在浪漫主义那里,讽刺表征的是精神与虚假现实之间的对比,通过将主体精神上升至本体地位,从高处审视虚假的现实。类似地,马克思在批判塞利加时着眼于《巴黎的秘密》的具体内容,将小说中对“秘密”的表述与塞利加的解读进行对比,再现小说人物的现实关系。与塞利加思辨化解读的人物形象形成对比,马克思指出思辨塑造的虚假抽象与社

^① 马克思在1842年上半年曾写过一篇专论浪漫主义的文章《论浪漫派》寄给阿尔诺德·卢格,这篇文章清算了他同浪漫主义之间的思想关系,但遗憾的是并未留存下来,相关书信参见:卡·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4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9页。

^②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254页。按:本文中《神圣家族》的引文首先采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节选版的新译文,未被节选的内容则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又,鉴于《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作品,为准确分析马克思的思想,本文严格区分了二人各自撰写的章节,涉及《神圣家族》的引文除二人合写的《序言》外,其余均出自马克思所写的章节。

会现实之间的对立,批评塞利加对小说描绘现实的遮蔽与曲解。最终马克思认为,“欧仁·苏和自己的思辨的解释者相反”^①,塞利加将《巴黎的秘密》视为佐证思辨结构的材料只是一厢情愿。

马克思对塞利加的批判显示了他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裂隙,这也是学界目前解读《神圣家族》第五章、第八章的一般进路。由于马克思在批评过程中置身于小说自身的浪漫主义体系,也在深层次上展示了马克思对待自身曾青睐的浪漫主义的思想态度,这一点却通常为学界所忽视。通过马克思分析《巴黎的秘密》的文本可知,马克思的思想已摆脱了大学时期的浪漫主义痕迹。面对如何克服黑格尔哲学的局限这一问题,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同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的解决方案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通过将抽象的概念能动性转化为人类意志的主观能动性,以人的意识取代神的意识来观照历史真实,也就是鲍威尔所说的无限的自我意识。而马克思已意识到该方案的根本缺陷,即批判的头脑无论怎样发明和实现历史,归根结底都只能成为理论武器而非现实武器,思辨体系仍然维持着自身的理论圆满性并只是世界的哲学化,无法激发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因此,马克思实际上并未继续扩大自己学生时代思想中的浪漫主义因素,未像青年黑格尔派一样滑向主观唯心主义,而是着手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改造为行动哲学,将个别自我意识理解为人的自由意志,以进入实践领域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

当马克思与浪漫主义再次相遇时,他虽然借助《巴黎的秘密》所描写的现实生活现象批判思辨哲学,但并不承认小说中社会变革方案的可行性,并自觉反思浪漫主义在改变世界、解决社会矛盾的现实力量上的不足。这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马克思运用浪漫主义的反讽时对其进行了主客视角倒置的改造,表现出他对浪漫主义将精神作为主体地位的不满。反讽的诞生源于浪漫主义试图解决现象与本体二元化造成的主客体关系的不确定,主要是通过拔高精神审视现实,以无限的精神超越有限之物的限制,以现实的虚假性与精神的真实存在来消解现实和主体的矛盾,这导致浪漫主义往往能够觉察到现存世界受到非理性的主宰,却将非理性的始原排除在逻辑推理思维的范围。小说《巴黎的秘密》统一思维与存在的非理性方式依赖超乎现实的神秘精神力量,借助精神理解外界存在、自我存在。马克思分析《巴黎的秘密》时采取的是颠倒了反讽,他将现实置于高处,审视抽象的精神去批判思辨哲学,摒弃了浪漫主义对精神的主体定位,披露了小说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归因于自然属性和非理性的神秘主义倾向。马克思指出,《巴黎的秘密》虽然内涵上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反思,但始终使用非理性的方式解释世界,现实主义的特征局限在具体描写的层面,依然饱含追求精神层面完满的浪漫主义特征。另一方面,马克思借助浪漫主义强调人物个体感性的特征代入小说中的具体人物来阐释小说真正内容,但不满足于浪漫主义仅停留于思想批判却无视群众的现实力量。在批判塞利加时,马克思以小说主人公鲁道夫公爵出访巴黎的行动为核心线索,历时性梳理小说中其他人物的个体活动。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肯定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不平等现象,“大多数国家的信条都一开始就规定富贵贫贱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②,又不满足于小说仅停留在具体感性的现象描写,一旦涉及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便陷入脱离客观规律的空想。小说中鲁道夫公爵的社会改造行动则是小说脱离实际的空想内容,作者赋予鲁道夫雄厚的财力完成一系列赏善罚恶、举办实验农场以及追求自由平等的行动,却无视金钱力量的现实根源。马克思认为,“在鲁道夫的手中,傅立叶的学说得到了通俗的阐明”^③,小说改造社会的方案接近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二 马克思与浪漫主义的核心分歧:“精神”与“实践”的对立

1844年底,马克思已经从学生时代的浪漫主义青睐者转变为浪漫主义反对者。由于马克思未将浪漫主义作为自身理论阐释的主题,使得这种变化表现出极大的反差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思想变化无迹可寻,从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的历程出发,结合其偶尔提及浪漫主义时的态度与评价,仍能够推测二者产生分歧的原因。

马克思同浪漫主义的分歧诱因可以追溯至其大学期间。在1837年11月写给父亲的信件中,马克思在

①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3页。

②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0页。

③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7页。

总结自身过去一年的思想状况时这样评价他在 1837 年上半年写给燕妮的浪漫主义诗歌：“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抨击，漫无边际、异常奔放的感情，毫无自然的东西，纯粹的凭空想像，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截然对立，以修辞上的刻意追求代替充满诗意的构思、不过或许也有某种热烈的感情和奋发向上的追求，——这就是我赠给燕妮的头三本诗集的特点。”^①马克思写给燕妮的诗集虽然冠以《爱之书》、《歌之书》的名称，但他在这些诗歌中向燕妮表达爱意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当代的抨击”，特别是阐发了“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截然对立”这一当时德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通过对当时德国理论界的审视，马克思只能看到保守、倒退与停滞不前，世界历史“只是坐在安乐椅上反躬自省，从精神上探究自己的活动——精神活动”^②。马克思在投身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同时对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也越发感知深刻，这促使他开始探寻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也构成了他逐渐远离浪漫主义的诱因。

在此之后，马克思对待浪漫主义的批判态度可以从他对历史法学派的评论中发现。从 1842 年 4 月 27 日致卢格的信中可以得知，马克思曾写过一组在“内容上都是相互联系的”文章，包括“(1)《论宗教的艺术》，(2)《论浪漫派》，(3)《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4)《实证哲学家》”^③。其中，《论浪漫派》由题目推测应是专门讨论浪漫主义的文章，但这篇文章由于未曾发表流传以致无从考察它的内容。幸运的是，写作于同一时期并在内容上相互联系的《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得以保留，可作为窥探马克思此时思想的重要材料。马克思写作《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的缘由是当时德国法学界在是否应该在启蒙理性主义指导下制定一部统一的民法典这一问题上产生了争论。以胡果、萨维尼等人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反对理性主义而推崇历史主义的立法原则，希望根据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来制定法律并具有回归前现代罗马法传统的浪漫主义倾向。马克思撰写《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批评胡果，他指出：“18 世纪流行过的一种虚构，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本性的真实状态。”^④“虚构”指的就是 18 世纪在欧洲流行的浪漫主义思潮。马克思认为，历史法学派以历史主义立法原则追溯德意志民族精神起源是不加反思地将近代法律奠基在前现代的罗马法体系之上，这与浪漫主义不谋而合，受到德国浪漫主义先驱约·哥·冯·赫尔德的影响，是阻碍社会变革的保守主义立场。马克思批评历史法学派把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当作“是一幅幅描绘人类真实状态的纯朴的尼德兰图画”，认为其暗合了赫尔德“自然人都是诗人”的观点，并讽刺“胡果就是还没有接触到浪漫主义文化的历史学派的自然人”^⑤。虽然马克思的批判矛头直接对准的是历史法学派，但隐含的批判对象也包括浪漫主义，所以他才会在答复普鲁士查封《莱茵报》的内阁训令时隐晦地表明，《莱茵报》在一系列关于德国社会生活原则问题上的立场之一就是“反对浪漫主义思潮”^⑥。

《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主要站在启蒙理性主义立场上同浪漫主义相对立，二者的核心分歧聚焦于如何解决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之间的对立。此时，马克思仍是法国启蒙思想的追随者。他批判历史法学派背离了法学的普遍性诉求而只是“专制暴力的法”^⑦，表现出了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倾向。马克思极为反感胡果和萨维尼等人思想中竭力维护普鲁士专制制度的保守主义，并展现出推动现有之物向应有之物转化的思想态度。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至少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法哲学具有一致性，虽然后者仅将社会不公的原因归结为理性未能彰显，但仍然在客观精神的自我完善中表现出否定现有之物的辩证法内核。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浪漫主义完全缺乏克服现有之物与应有之物对立的愿望，问题只是在于其克服这种对立所使用的反讽方法。浪漫主义坚持“反讽是无限绝对的否定性”^⑧，但反讽将精神“置于高处”的超然态度只是在对精神自由的无限拔高中否定现实来实现二者的综合。浪漫主义反讽的主观性曾招致黑格尔的不满，在他看来，反讽就是费希特主观哲学发展的终极形式，德国浪漫派将个体本质置于精神不间断的内在革命过程，实际上是以不

① 卡·马克思《致亨利希·马克思》(1837 年 11 月 10—1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第 7 页。

② 卡·马克思《致亨利希·马克思》(1837 年 11 月 10—1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第 5 页。

③ 卡·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 年 4 月 2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第 28—29 页。

④ 卡·马克思《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1842 年 7 月底—8 月 6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229 页。

⑤ 卡·马克思《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1842 年 7 月底—8 月 6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229—230 页。

⑥ 卡·马克思《评部颁指令的指控》(1843 年 2 月 4—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29 页。

⑦ 卡·马克思《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1842 年 7 月底—8 月 6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238 页。

⑧ 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汤晨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5 页。

严肃的态度把生命的运动归结于想象,缺乏实体和历史的维度。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反讽对现实持否定态度,但是“作为一个自在存在,那个生命诚然是一种清澈透彻的自身一致和自身统一,它不会严肃地看待他者存在和异化,也不会严肃地看待对于这种异化的克服”^①。反讽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否定不涉足现实与实体而只存在于主观精神当中,企图以非理性的直观和情感来消解现实的矛盾却不能真正克服异化。从这一分野来看,马克思同浪漫主义的分歧同样也是出于对反讽否定现实世界方式的不满。《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不满浪漫主义超脱尘世俯察现实的理想态度,不得不转向黑格尔哲学以解决自己的精神危机,并在面临“物质利益难题”时察觉到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缺陷。特别是精神自由的理论“应然”和普鲁士民众实际受压迫的“实然”、国家在理论上作为“道德理念的实现”却在现实中处处维护私人利益的巨大反差,迫使马克思的关注重点从追求精神自由转变为关心贫困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进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来重新发掘现存之物向应有之物转化的否定性力量。

从这一视角看,辩证法超越浪漫主义反讽的地方在于它阐述了矛盾对立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在面对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时,黑格尔辩证法将精神一分为二,从自身转化到对立面,同时在对立面中保持自身,再将对立面加以扬弃返回自身,实现由自在到自为的过渡,这就是浪漫主义反讽缺失的“中介”过程。黑格尔认为,浪漫主义之所以“嫌恶中介”,是因为它没有意识到中介和绝对之间的同一关系,“中介活动不是别的,恰恰是一种自己推动着自己的自身一致性,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自身反映,是‘自为存在着的自我’这一环节,是一种纯粹的否定性,或者在其纯粹抽象的层面上看,是一种单纯的转变过程”^②。在辩证法的视野中,任何一种事物都存在自我否定的倾向,现存之物与应有之物之间存在张力,这导致事物及其历史永远处在运动发展之中。自在之物实现连续发展的中介过程必须在内容规定上具有连接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共同载体,在黑格尔辩证法中充当这一载体的通常是自我意识。这也导致了黑格尔虽然批判浪漫主义的主观性特征,但在根本上仍以客观精神为主体,其辩证法从理念的绝对同一性假定开始而不是从思想的对方开始,从而造成了一种“思辨的独白”^③。按照黑格尔的思想,中介所具的动力仍出自精神主体,开端成为了目的。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具有历史维度,却只能有限地解释世界,并未真正发挥否定现实的功能,甚至会造成“凡是现实的,都是有理性的”^④这种意识形态幻象。

在1843年后,马克思逐渐离开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继续推进将辩证法带入现实的工作。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辩证法从而使其“双脚立地”,既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也是对浪漫主义的更深层次背离,其结果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以社会生活实践作为现实的中介载体,并致力于从现有之物出发寻找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否定性力量。在同浪漫主义的再次相遇时,马克思已初步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审视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这一问题。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以从事实活动的人为前提,在实践活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中消解实然与应然的裂隙,从而与浪漫主义拔高精神实现绝对同一性的路径截然对立。马克思特别指出,历史不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⑤。实践中介的概念呈现出其辩证法与浪漫主义反讽的核心分歧,通过将精神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并以实践中介理解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之间的张力。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呈现了基于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矛盾运动的历史动力学,真正解开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之谜。马克思通过实践中介打开了真正的历史科学,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在超越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也超越了浪漫主义反讽。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与浪漫主义之间的核心分歧就可以理解成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精神”与“实践”之间的对立。

三 马克思的思想飞跃:超越浪漫主义的实践观

在经历“离开黑格尔”这一思想史事件以后,写作《神圣家族》时的马克思已经不再是浪漫主义的追随者。那么,马克思借助浪漫主义的性质分析《巴黎的秘密》,就没有内含对浪漫主义的肯定,而只是利用浪漫主义

①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②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第13页。

③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批判》,王太庆、万颀庵译,《费尔巴哈文集》第11卷,洪谦等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98页。

④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⑤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

的话语体系审思现实和批判思辨哲学,重思社会矛盾、历史发展等问题。此时马克思的思想已在不断接近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实现了对浪漫主义的超越,这主要可以从马克思的实践观中体现出来。在《神圣家族》写作之前,无论是浪漫主义的主观精神还是黑格尔哲学的客观精神,其所使用的反讽与辩证法都因未真正进入实践领域而只停留于思维领域,因而在根本上都是对现存世界的抽象反映而非真实否定,只是“超实践”的哲学。“正因为哲学过去只是事物现状的超验的、抽象的表现,正由于它自己的这种超验性和抽象性,由于它在想象中不同于世界,它必定会以为事物的现状和现实的人是远远低于它自己的;另一方面,因为哲学过去并不是在实际上与世界有所不同,所以它也就未能对世界作出任何实际的判断,未能表现出对世界有任何现实的识别力,也就是说,未能通过实践来干预事物的进程,而至多只是不得不满足于抽象形式的实践。所谓哲学曾经是超实践的,这只是说哲学曾经飘浮在实践之上”^①。与这种“超实践”的哲学相反,马克思认为,哲学应当切入现实,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实践相结合来获取现实的力量,真正站在现有之物的对立面发挥自身的否定性作用。马克思的这种实践观具有重大的思想史意义,其摆脱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实践同理论相分离的状况,将改变世界的物质武器与理论武器相统一,实现了重要的思想飞跃。得益于这一思想飞跃,马克思能够真正以实践为中介完成否定现有之物的目的,从而实现对浪漫主义的超越。这种超越,在《神圣家族》中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得以呈现。

第一,马克思指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固有矛盾必然会导致人类社会朝着更高的形态前进,而这一过程必须由人民群众生产实践的不断发展来完成,超越了浪漫主义推进历史进步方案的空想性。在马克思看来,浪漫主义对社会矛盾的解决有一种天真态度,突出地表现为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否定,这主要是因远离现实而导致的认知局限。在浪漫主义那里,“人民”是一个重要概念,其通常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指国家中包含普通大众的特定阶层,另一种则代指民族。德国浪漫派先驱赫尔德认为,“人民”既构成了社会中的底层秩序,也是民族精神的创造性来源,但是,作为多数人的人民并不具有实现社会进步的能力。赫尔德指出:“从世袭君主制向自治民主制的转变并不纯然是自然发展的成果,也不是普通人在完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依靠自己力量自我提升的结果……需要某种形式的领导来帮助人民实现所渴望的那种转变。”^②因为民族精神只有精神上具有敏感性的人才能感觉到,导致了浪漫主义者往往会设想具有卓越能力、民族气质和献身精神的政治领导者来推动理想政治的构建,赫尔德将这部分人称为“贵族民主派”。在《巴黎的秘密》中,主人公鲁道夫公爵被塑造成救世主,鲁道夫实施的一系列社会改造行为体现出社会精英创造理想社会的空想特征。对此,马克思着重批判了《巴黎的秘密》对人物现实活动描述的不合理之处,指出小说中的主体仅凭精神理念实施社会改造,脱离了现实物质生产,夸大了少数社会精英、统治阶级的能力,合理化了统治阶级压迫群众的行为。如在鲁道夫公爵设想的“模范农场”里,“单只是农业居民所消费的肉类就会多于全法国的肉类生产量,所以,这种批判的改革最后就会完全消灭法国的畜牧业”^③。马克思认为,鲁道夫公爵这种不切实际的“善行”如同精神鸦片只会导致人民群众的麻痹,统治阶级尝试缓和阶级矛盾的真实企图只是妄想以不损害自身根本利益为前提,最小成本地压制矛盾,保障自身统治地位以达成持续性的剥削目的。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是广泛且真实存在的,这种社会矛盾不能够凭借统治阶级主导的改良来解决,而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运动来认识。马克思认为,浪漫主义对个体感性的强调虽然能够显现矛盾的现实性,但却未能认识到矛盾双方的阶级性质。马克思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解析社会矛盾并指出,统治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造成其与全体无产者的彻底对立,使得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私有制社会分裂为经济地位截然对立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财富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整体。它们是私有财产世界的两种形态”^④。由无产者构成的人民群众所面对的社会矛盾并非浪漫主义所说的民族内部的个人恩怨,而是以阶级对立形式广泛存在的阶级矛盾。在

①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4—265页。

②伯纳德《赫尔德与卢梭——民族文化和政治合法性》,姚啸宇译,冯庆编《历史主义与民族精神——启蒙语境中的赫尔德》,姚啸宇、包大为等译,华夏出版社2021年版,第176—177页。

③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54页。

④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0页。

这种极端不平等的条件下,统治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只会使人民群众成为“自由”的奴隶,工人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得以苟活,无产阶级要么“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①,要么“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②。马克思已然超越了浪漫主义以民族身份来界定人民群众社会属性的片面理解,揭露了浪漫主义所倡导的社会改良方案对人民群众的虚假承诺和对人民群众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实践能力的现实依赖。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实践所具有的否定性方面来理解社会矛盾运动,即在商品生产过程中随着分工和交换的扩大,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社会化进程中难以为继。否定之否定的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③。虽然物质生产天然地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但正是这种具有利己性质的生产实践活动构成了不可遏制的历史运动,推动着社会矛盾的不断转化和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

第二,马克思从人民群众实践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出发,揭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主体,超越了浪漫主义基于自然法则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在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观点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发展就是潜能得以展现的过程,人类历史进步与植物或有机体的生长并无不同,因此历史推动者的职责就是唤醒人民自身潜在意识和功能。另一种观点认为,发展是行为目的的共同结果,人类历史并不由既定的自然法则内在规定,而是人们在行为观念指导下的实践产物。在这一问题上,浪漫主义属于前者,而马克思则偏向后者。从赫尔德开始,德国浪漫派就明确树立了有机发展主义的历史观,这种观点反对启蒙理性主义倡导的人为的、机械的社会契约,试图代之以基于民族历史的、有机的新契约。在德国的浪漫主义者看来,“国家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一个巨人,一个活的个体;它是许多个人的总和,这些个人不仅是由合理的契约联系在一起,而且是由血统、遗传、传统和历史有机地关联着的”^④。这种基于自然法则的契约由于具有目的论和进化论的色彩而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对立。马克思虽然承认人的自然性作为人的社会性基础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毕竟“正是自然必然性、人的本质特性(不管它们是以怎样的异化形式表现出来)、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联合起来”^⑤,但他认为,人的实现绝不是纯粹的自然法则的展开,自然需要的满足在实践过程中必然导向对良善社会关系的需要。市民社会中的利己主义的个体作为感性的现实,“他的每一种生命欲望都会成为一种需要,成为一种把他的私欲变为追逐身外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需求”^⑥。虽然人的活动在自然中展开,需要尊重自然规律,但历史变迁是因人追逐自身目的的实践活动而展开的,而非自然法则的逐步显现。马克思批判浪漫主义将自然视为可以独立于人并不断生成历史的原初,认为人类历史并非自然生活过程而是人的自主创造性活动,人在追求自身需要的实践活动中创造了历史。

马克思超越了浪漫主义实现历史发展的非理性路径,从实践的观点出发揭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马克思认为,人无法在浪漫主义想象的原初自然中获得自我,他虽然在分析《巴黎的秘密》时为女主人公玛丽花在自然界中释放天性而感到欣喜,但也批判屠夫淳朴自然天性的粗鄙。马克思追求的是人的自然性在社会中的实现,是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实践的统一。浪漫主义脱离了群众的精神主体虽然能够审视现实,但也只能止步于理论批判、提供空想的社会改造方案,并不能实质性解决社会矛盾,推动历史发展。在马克思看来,推崇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无益于促成革命,反而会起到阻碍进步的反作用。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阐明了现实的生产实践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观点。他认为,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历史的策

①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1页。

②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③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

④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范德一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8—69页。

⑤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22页。

⑥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22页。

源地,“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①。思想不同于实践行动,拥有思想的人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将主体对象化、将主观诉求变为客观现实。虽然实践活动受到自然的、历史的条件限制,但只有把实践作为逻辑起点才能够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正是实践活动的展开在不断重塑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能量变换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实践主体,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基于对人民群众劳动的持续剥削,资产阶级不仅需要加深剥削的程度而且客观上依赖着持续性扩大的劳动力队伍。面对恶劣的社会生活条件,人民群众作为被剥夺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而同资产阶级相对立,“在这种对立内,私有者是保守的一方,无产者是破坏的一方。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②。无产阶级在私有制中增加自身的力量,也在私有制中为资产者生产压迫自身的财富,为自身创造不得不抗争私有制的生存处境,而由于消灭私有制是获得解放的唯一方式,人民群众就必然承担起推翻私有制的历史任务。“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完全明确起来”^③,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不仅创造了现有历史,同样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推动历史向着更高的社会形态发展。

马克思在学生时代受到过诸多来源的浪漫主义思想影响,以至于在反思黑格尔哲学时曾使用了拔高人类意志的主观能动性的思路。但这并未导致马克思像青年黑格尔派一样滑向主观唯心主义,而是成为马克思转向实践领域寻找历史发展真正动力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从物质利益问题角度审视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问题,使得他能够完成改造黑格尔辩证法以及将否定辩证法带入现实的工作,以实践中介超越了浪漫主义反讽。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运用浪漫主义分析《巴黎的秘密》的主要目的并非阐述浪漫主义思想,而是阐明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马克思以批判思辨哲学为起点,根本否定了浪漫主义的精神主体,主张回归现实以探明社会历史发展的真谛。他从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出发,兼顾理论与现实的批判,阐明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真正主体,不仅超越了浪漫主义,超越了《巴黎的秘密》的空想精神内核,还为推动社会变革、实现人类解放奠定了科学而坚实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浪漫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④。资本主义的兴起使马克思同浪漫主义面临共同的课题: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贫困像财富一样大量产生的时代,浪漫主义和马克思都试图以否定性来矫正现实世界,以弥合现有之物与应有之物的裂隙。浪漫主义回归纯粹自然历史,寄希望于具有精神敏感性的精英群体构筑理想社会的方案,无视群众的真实苦难和革命力量,具有极大的空想性。虽然浪漫主义的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⑤,但依然应当以理论的武器加以批判。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批判了浪漫主义的空想性,阐发了物质生产实践推进历史发展的思想,指明了人民群众作为实践的主体的历史地位,从而将改变世界的物质武器与理论武器相统一,实现了在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上的重要思想飞跃。

[责任编辑:何毅]

①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20页。

②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1页。

③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2页。

④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5页。

⑤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5页。